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中国化早期进程中 “日本因素”的当代意义*

彭修银 尹一帆

【提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取道日本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期间他们大量引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术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的勃兴。在“日本因素”影响下的文艺理论家如蔡仪、周扬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构建展开了积极探索,丰富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有益成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留下了经验和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日本因素” 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7)05-0082-09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先进文化理念的亚洲聚集地。借由日本这个桥梁,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先进成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术语、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中的“日本因素”,不仅仅是为了展现中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历史上的共生关系,而且指向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即早期进程中的“日本因素”给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又为整个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建设带来了什么启示。下文主要围绕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术语引入、体系构建以及它的当代意义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82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术语引入

“术语”一词是近代以来的产物,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术语就是一部文化史,只有考其源流方能真正把握术语,并透过术语窥探社会——文化的变迁。”^①日本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中的桥梁,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日本馆藏近代以来中国留日文艺理论家资料整理与研究”(12&ZD16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冯天瑜、邓新华:《中、日、西语汇互动与近代新术语形成》,《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无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业术语的引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术语大多来自于苏联，日本在译介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有名词的过程中，其译介语言必然带有日本本土化的特色。而这种本土化特征却能够在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术语体系中得到传承和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中日文化特别是语言文化的渊源关系。

（一）“日源新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谈起中日语言文化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及“日源新语”这个概念。^①“日源新语”具体是指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在引入日文论著的过程中所吸纳的新词汇、新语言，即“一直居于汉字文化圈核心和语汇输出国地位的中国，转而从日本大量借取汉字新语，以弥补反映近代西方文化的语汇之不足”。^②在近代这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汇、新语言，这都得益于西学东渐过程中对西方文明的汲取，其中“日源新语”的比重最大。日本作为中介，将西方文化术语和概念与汉语进行了创造性对译，给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国当时作为先进西方文化的接受者，能够快速吸收日源汉字新语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何借由日本我们可以吸收汉字新语？日益西化的日本为何又掀起了汉字新语作为术语的高潮？这些问题在冯天瑜看来，都是有着复杂缘由的。他认为，日本翻译西学词汇大抵不过三种方法，即汉字音译法、汉语新义法和新创汉字法。其中，日本新创汉字则主要采取参照古典汉字的方式和遵照汉字造词法进行创新的方式。究其根源，尽管西学东渐的热潮在日本已经全面掀起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由于明治时期以来的日本学者大多还保留着“汉字为雅，日语为俗”的传统观念，这一时期的日本学者选择汉字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

使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相关术语实现了日本化的对译，而这其中不乏我们在上文提到的“日源新语”。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畴，一般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才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可能性。当然在思想文化交汇的中国大地上这种可能性并非绝对存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有专门的探讨，这里姑且不谈。因此本文谈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术语引入，必然要先谈到当时中国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的引用。德国学者李博曾列举过日语文献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及其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他以时间线索进行划分来阐述汉语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的历史和作用，即1903年以前汉语借用日语的相关术语，如“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阶级斗争”、“人民”、“政权”以及“唯物论”等术语；1903年以后汉语借用日语的相关术语，如“矛盾”、“辩证法”、“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践”等术语。^③对比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和语境，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多数借用日语的术语都得到了保留。接下来本文以“革命”一词为例，对这种对译进行简要说明。日语中“革命”一词对应的是英语单词“Revolution”，这是借鉴了汉字“革命”的古文义并进行了引申，而并非是原创词汇。“革命”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中关于“汤武革命”的论述，即指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的历史性变革。同时，在使用“日源新语”的过程中，很多词汇都是经过反复试验之后才找到最佳的表达的。例如，“工人阶级”逐渐替代“劳动阶级”的表述，“劳动者”与

① 彭修银、皮俊珺：《近代中日文艺学话语的转型及其关系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②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2页。

③ [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赵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工人”的含义由重合到分道扬镳等等。

总之，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日源新语”传递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内涵，而由“日源新语”定型下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术语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可见，“日源新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下文将以“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两个代表性术语为例，来重点论证“日本因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术语的关系。

（二）“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

“意识形态”，最早见于法语“Idéologie”，原义为“观念学”，其后逐渐在德国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术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意识形态做了如下表述：“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①其中，“冲突”是与社会变革相关的。而在具体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中，政治、宗教、哲学甚至艺术都被囊括其中。伴随着苏俄革命形势的发展，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新的定位，这使得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一步成熟起来。

近代以来，“意识”一词从日语转借而来，却并不是日本新创造的词汇，是典型的从中国古汉语中进行再发掘的“日源新语”。据考证，王充在《论衡》中就有了关于“意识”的表达，“众人阔略，寡所意识，见贤圣之名物，则谓之神”，^②其中“意识”可以理解为个人的见解。玄奘在佛教典籍《成唯识论》中对“意识”的定义值得我们参考，即除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触觉以外的“第六感”，也就是精神层面的感知力。在明治时期，日本开始使用“意识”一词与英语中的“Consciousness”（德语为“Bewusstsein”）进行对译。河上肇翻译的日本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其后的中译本都效仿这一对译形式，将“Bewusstsein-for-

men”对译为“意识形态”。只不过区别在于中文将西方术语中的“Bewusstsein-formen”与“Ideology”都译为了“意识形态”，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术语的使用范围。^③在中国，最早把“意识形态”引入政治术语范畴的是李大钊，而在文艺理论上对其使用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李初梨。^④1928年日本留学归来的李初梨先后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和《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等文章中对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阐述。由于当时日本政坛长期受福本主义的影响，其文艺理论思想表现出显著的苏俄意识形态性也是大势所趋。紧随李初梨之后，“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理论在周扬、瞿秋白以及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逐渐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重要内容。

“无产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文艺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术语之一，其成为专有术语的定型过程似乎比“意识形态”更为复杂，因此“Proletariat”与“无产阶级”的对译也更能彰显“日本因素”的作用。近代以来，日本对“Proletariat”一词的翻译有过几次变化，即从“下等阶级”、“平民阶级”再到“无产阶级”。“平民”在日语中的含义为“普通老百姓”，梁启超、宋教仁都接受了这一译法，但在中国这样的对译也遭到了非议。从含义上来看，“平民”是相对于“贵族”而言的，因此“平民”理应包括有产阶级。尽管这样的对译受到质疑，但在“无产阶级”这一译法出现之前的十几年里，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的译著大多使用了这种对译方法。由于该译法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一时期的中国还流行使用音译法，如译为“普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② 黄中业、陈思林译注：《论衡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07页。

③ 《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第311页。

④ 冯宪光：《“意识形态”（Ideology）的流转》，《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列塔利亚”。文艺理论上常见的译法有“普罗文学”、“普罗列塔利亚文艺”等。

“无产阶级”、“无产者”等术语在日本最早见于河上肇《共产党宣言》的译文中，这里的“无产者”在日文中的含义是“没有财产的人”。尽管这一译法在日本并没有得到普及，但李大钊却将这种译法带回了中国。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无产阶级”与我们后来革命文学中的“无产阶级”以及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概念。这也显示了“无产阶级”这一术语进入中国之后在内涵上发生的演变。例如，李大钊创造性地将中国定义为“无产阶级的民族”，这就将“无产阶级”这一术语放在了社会学的范畴内进行讨论，这里的“无产阶级”显然已经不同于日语中“没有财产的人”。又如毛泽东将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农村雇农以及其他城乡无产者都纳入了“无产阶级”的范畴，使“无产阶级”的含义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可见，术语的演变可以印证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发展过程，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依据之一。

总之，由日本引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术语在其自身的演变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变异，甚至逐渐脱离原义。我们不能忽视这一演变的过程及“日本因素”的价值。显然，“日源新语”的传播和使用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体系构建

我们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首先必须弄清楚其所属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畴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同时归属于中国近现代文艺理论体系之内。伴随着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国近代文坛曾经出现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古典文论以及其他西方文论

占据文坛的局面。然而由于“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因此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当时的文艺观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渐占据文坛，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渐走向了统一。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由于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了文艺界和政界的共同需求。尽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日本路径此时已经被苏俄路径所替代，但“日本因素”的影响力还在继续。本节将通过两个部分进行例证，即“蔡仪与中国现代文论体系的构建”和“周扬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构建”。

（一）蔡仪与中国现代文论体系的构建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占据了重要位置。从探讨文艺本质问题的意识形态论，到对文艺创作方法的唯物辩证法、文艺作品形象的典型论以及文艺接受论的文艺大众化观念等的阐发，蔡仪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下面我们以蔡仪为代表，来论证“日本因素”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体系构建之渊源。蔡仪，字南冠，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1929~1937年间蔡仪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和九州帝国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蔡仪毅然加入日本的左翼组织“唯物论研究会”，之后便广泛接触到了由苏联翻译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些都为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少影响。他自己也承认自第一次接触到日译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特别是其中提倡的现实主义与典型的理论原则对他以后的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②1937年蔡仪从日本回到北平，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② 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始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相关工作，先后写出了两部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乃至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的著作，即《新艺术论》与《新美学》。在这两部著作中，蔡仪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准则、文艺大众化的接受论以及文艺作品的典型论观点都进行了科学、系统的阐释，因而它们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构建的代表作。

蔡仪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最早以唯物辩证法对文艺理论进行建构的文论家，^①这主要得益于他在1942年完成的著作《新艺术论》。然而这部著作却与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有着极大的渊源关系。日本“唯物论研究会”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主力军，当时在日本哲学界、文艺理论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代表人物甘粕石介主张的“按照建设新艺术科学的目标”也为蔡仪提供了新的思路。^②我们在对比蔡仪与甘粕石介关于艺术论的建构问题时，发现曾作为“唯物论研究会”成员的蔡仪在《新艺术论》中对典型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的揭示以及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合理运用都可以在甘粕石介的著作中找到相似的表述。另外，从《新艺术论》的内在结构上来看，蔡仪也表现出与甘粕石介思想的亲近性。蔡仪在书中对现代艺术理论体系构建进行了大胆且行之有效的尝试。他首先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与科学的关系、艺术与技术的关系上对“艺术是什么”进行了解答。他认为认识是现实的反映，因此艺术是一种认识的表现。其次，他对艺术的表现内容、作用和技巧进行阐述，并对艺术的诸种属性进行概括。再次，他还针对典型、现实主义以及艺术评价等重要问题对艺术进行多维度的全面介绍。而这与我们当代的文艺理论著作中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其创新性和对后世的影响力。蔡仪的《新艺术论》除了在结构上与当代文艺理论表现出相似性之外，在内容上也不乏至今都被奉为经典的言论。例如，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

的关系以及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等，这些论述大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我們研究当代文艺理论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由于《新艺术论》在中国文艺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蔡仪再接再厉创作了《新美学》一书。此书除了与《新艺术论》都同样采取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以外，还提出了“客观典型论”的观点，引发了中国美学界关于“美的本质”的大讨论，影响十分深远。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理论之一，从文艺理论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讨论也可以看得出苏俄、日本以及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系上的同源性。诚然，套用哲学观点的文艺理论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有其存在的理由，藏原惟人借用“拉普”的创作法则重新定义无产阶级文学也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这同样可以解释其理论主张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得到普遍认可的原因。然而由于传播时间的延误性，苏俄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理论进行清算之后，“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中国“左联”的推动下依旧作为当时唯一科学的创作法则而盛行。以甘粕石介为代表的日本“唯物论研究会”对苏俄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明显对蔡仪产生了影响。蔡仪本人也不认同“拉普”在强调唯物辩证法创作法则的基础上错误地将世界观与方法论混淆的行为，这也说明蔡仪关于艺术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不全然来自于苏俄的直接影响。在此，中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表现出了极强的谱系渊源关系，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主观能动性。

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先后出版了两本具有权威意义的文艺理论教材，一本是蔡仪于20世纪70年代在《新艺术论》《新美学》的基

^① 季水河：《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② 李圣传：《蔡仪“典型论”美学观建构的日本资源》，《河北学刊》2015年第6期。

础上编写的《文学概论》，另一本则是以群在 20 世纪 60 年代编写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同样作为留日生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以群的文艺理论体系也同样离不开“日本因素”的影响。然而有趣的是，这两本教材都是在周扬的监督和指导下完成的。且一般认为，以群版的文艺理论教材是与周扬文艺路线相符合的，但蔡仪的理论成果却是有些偏离周扬文艺路线的。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存在着一些分歧。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同样留日归来的周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设中又有着什么样的理论建树？

（二）周扬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构建

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中缺乏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构建，但正如卢卡契所言：“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史的最普遍的原则我们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中找到。”^① 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理应是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不同角度向我们阐述了以下问题：文艺的本质、文艺与社会物质生产的关系、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现实主义与典型问题以及文艺批评的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等等。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对于其体系的建构也逐渐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如果说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大多致力于运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那么周扬无疑是最早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果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之中的文论家。下文我们就从“日本因素”的角度，阐明周扬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构建间的具体关系。

周扬，原名周运宜，字起应。1928 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随后于 1930 年离日，因此其留日时间相对较短。但周扬回国之后依然持续关注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对日本文坛之后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

观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同时他还参与规划了东京“左联”的重建工作等等。周扬从日本回到上海之后，积极参与了国内关于文艺大众化、现实主义、典型论等问题的讨论，陆续发表了《关于文学大众化》《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等文章。特别是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中对于“拉普”唯物辩证法创作论的批判，成功地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引入了中国，并使其在延安时期以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创作原则。在周扬看来，“新的现实主义不但不拒绝，而且需要以浪漫主义为它的本质的一面”。^② 有学者因此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周扬文艺思想的起点。这个说法可能过于绝对，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思想的历史进步性。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周扬已经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中国文艺的具体问题。1937 年周扬发表了《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文，这是他继《现实主义试论》之后正式提出关于文艺的现实主义问题。同时他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两者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③ 这一观点对我们历史地、辩证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进程是有所启发的。这也为其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周扬先后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受《讲话》精神的影响，1944 年周扬编录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这本书是最早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谱系的著作。他在书中将鲁迅、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普

① [匈] 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75 页。

② 《周扬文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2 页。

③ 《周扬文集》第 1 卷，第 228 页。

列汉诺夫、列宁等人一同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作家之列，将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马列文艺思想相结合，并重点阐发了《讲话》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周扬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问题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归纳为五个部分：“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作家，批评家”。^①其中，第一部分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第二部分“文艺的特质”则包括对文艺形象、典型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观点的论述。第三、第四部分“文艺与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文艺”则重点从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文学的党性原则以及对文化的批判等角度进行阐述。最后一部分“作家，批评家”是从作家素质修养以及文艺批评两个角度进行的论述。全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试图从文艺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文艺政策论等角度全面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周扬的这种体系结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以群编写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般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论述主要体现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讲话》主要从文艺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和接受论等方面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建构，它总结了“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科学成果，并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相结合。《讲话》属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但它的形成与鲁迅、李初梨、周扬、冯雪峰、林焕平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早期进程中的贡献或有关联。因此，周扬对《讲话》的认同，其实也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进程的肯定。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既是具有中国实

践特色的产物，也与“俄（苏）—日—中”模式的横向移植相关。因此，关于本土派与苏俄派的论争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后，也必然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体系的建构。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蔡仪版和以群版文艺理论教材的思想差异，周扬曾针对蔡仪版《文学概论》在教材编写讨论会上进行质疑，并对其文艺功利论思想进行了批判，可以看出周扬思想的进步性和发展性。同样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蔡仪和周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路线问题上却逐渐出现差异，但他们无疑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构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注意：首先，思想的差异性并不是永久的，人的思想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次，思想上的差异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体现的则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内涵的丰富性。

三、“日本因素”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中的“日本因素”，反映的是借日本这个窗口，中国成功借鉴和学习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将其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相结合的过程。我们回顾早期进程，主要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本因素”作为外来文化，即日本文化和苏俄文化的双重载体，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曾起到了影响，也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带来了前进性和曲折性的历程。总结其发展脉络，有助于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留下启示。

（一）文艺与政治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文艺理论研究、文化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借由日本途径接受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了与苏联相近的倾向，这也反映出了苏联、日本、中国马克思主

^① 《周扬文集》第1卷，第454页。

义文艺理论的同源性。

纵观早期进程中的“日本因素”，我们将会联想到以下关键词：“左翼文艺”、“无产阶级文学”、“大众文艺”、“意识形态”等。这些词汇连缀起来便可表现出早期进程中中国文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种亲密关系的成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当时的政治状况以及革命发展的需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直处在变革的时代机遇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更多的是作为革命的武器，而不仅是为了理论的交流。那么从起点上来说，我们引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就是为了革命，因此文艺与政治走在了一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因而导致传统文艺很少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这便是文艺与政治相结合的基础。再次，日本“福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被引入中国，伴随而来的“阶级至上”、“激烈没落”论、“分裂—结合”等极端思想是当时文艺走向政治的催化剂。

文艺与政治在早期进程中表现出的亲近性，导致在此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依然保持着这种一贯性。正如伊格尔顿用“政治批评”来概括文艺批评一样，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与政治的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当代文艺理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讨论并没有停止过，但随着研究视域的扩展，在跨学科研究背景下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更应从辩证的角度来进行。

（二）西化与本土化

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中“日本因素”的当代意义，必然包含着中国在借鉴国外经验和先进文化成果的过程中获得的启示。本文将之归纳为西化和本土化的矛盾性与统一性。针对这一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正如本文承认“日本因素”一样，借鉴和吸纳某一方面的先进文化成果的做法是

可取的，是值得提倡的。这可以通过两个例子进行说明，即中日“师生”关系的变化和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化。在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日本从公元7世纪便开始了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漫长历程，这是中日“师生”关系的起点。然而伴随近代西学的渐盛以及中国封建传统社会的没落，自“兰学”兴盛到明治维新运动，日本走向了西学东渐的道路。因此，中日“师生”关系发生了转换，中国逐渐开始通过日本来观看西方文明的盛景。同时，对于日本而言，除了中日“师生”关系的转换以外，日本能够顺利实现资本主义化还得益于其包容并蓄的学习态度。与日本谦虚地学习西方的态度相比，近代中国显得有些固步自封，这也导致了当时的中国在实现近代化的道路上更为艰难。近代以来中日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唯有保持更加包容、谦逊的学习态度，才能在发展中获得持续的动力。

其次，借鉴和吸纳其他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必须对其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如饥似渴地吸纳西方文明成果之时，应该对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取道日本，使得国人认识并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但国内学者在对待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态度上却是泾渭分明的，他们或狂热地推崇或盲目地排斥，呈现出全盘西化或固步自封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采取冷静、科学、客观的态度对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源头、形态和特色进行分析，弄清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否能代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表现形式，以及它的理论形态是否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与壮大等问题，否则可能吸纳错误的或者是片面的文明成果，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畸形化或偏激化现象。至于到底是全盘照抄还是辩证地吸收的问题，答案肯定是后者。因此，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学习者要有去伪存真的眼光。

最后,借鉴先进文明成果为己所用必须因地制宜,也就是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具体国情除了包括中国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以外,还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受众心理的接受能力等因素。然而仅仅考虑现实国情的需求还不足以合理运用外来文化,仍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把握:第一,考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适应性,例如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在现实、政治、文艺等问题上的一些相似性,其在中国的传播更具有群众基础。第二,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应坚持真理原则。排外不可取,但崇洋媚外亦不可取。第三,应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创造性地结合,从而建构更加有生命力的理论成果,形成更加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

毛泽东曾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使其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进程,是西方文明成果借由日本这个中介走向中国本土化的过程。而研究早期进程中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给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留下了颇多启示,这些值得我们思考。

本文作者:彭修银是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尹一帆是中南民族大学审美文化研究中心助教,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左杨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Japanese Factors” in the Marxist Siniciz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at Its Early Stage

Peng Xiuyin Yin Yifan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1930s, a number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learned the advanced Western culture via Japan. During this period, they introduced to China a lot of terms from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and the early prosperity of Marxist literary move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factors”, some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ists such as Cai Yi and Zhou Yang, had actively explored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enriching the beneficial results of the early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providing the ideolog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ntire Marxist siniciz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theory, and offering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Marxist siniciz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Japanese factor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